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一 包尔汉(1)

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二 包尔汉(109)

盛世才入新夺取政权的经过 宫碧澄(173)

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统治权的 周东郊(185)

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统治 周东郊(205)

1944 年盛世才在新疆的最后一次大逮捕 李帆群(240)

吴忠信主政新疆纪略 曾小鲁(253)

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一

包尔汉

一 我的故乡、祖国

如果说新疆也有鱼米之乡，阿克苏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阿克苏是以阿克苏河得名的，译成汉语是“白(阿克)水(苏)”。它汇合从天山南麓流来的昆阿立克和托斯干两条河，浩浩荡荡地往南流去，滋润着塔克拉马干大沙漠西北缘的土地。多少世纪，劳动人民在这里斩棘披荆，把它建成为盛产稻米、棉花、水果之乡，河里的鱼也是捕之不尽的。

这儿便是我的故乡。

故乡是美丽富饶的。但是在人剥削人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手创的鱼米之乡却成了王公大人們的乐园。十八世纪末，活不下去的农民会自发地起来反抗；但是在封建主的武装镇压下，我的上五代祖帕拉提随着以玉素甫为首的二十多户贫农离开了依列克村，逃亡到中亚。他们在继续西进的道路上被沙俄的官吏们截留下，强迫他们定居到哈桑省内的森林里，要他们在那里伐木垦荒。这二十多户流亡的贫农同原有的少数移民，被迫付出艰辛的劳动，在那里建立了农村。他们念念不忘故乡，就把这个新地方也叫作阿克苏，尽管那里没有浩荡的大河。这个小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便诞生在那里，并度过了我的童年。

我的祖父郭拜都拉——腰已累弯了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常

常给我讲故乡的风物。他说过的下面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们的故乡阿克苏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那是在遥远的中国。中国才是我们的祖国呢！”

祖父爱恋祖国，总想在有生之年把一家人拖回去，尽管他也诞生在中亚。他说过：“真主把土地赐给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来养活自己。但是只有祖国的土地才是最温暖的。阿克苏河水比别处的蜜汁还会甜吧！”

到了1907年，也就是我的祖父故去的第二年，我跑到哈桑去投奔我的舅父，实现求学的理想。

原来我的父亲沙赫都拉在家里种地，生活是很苦的，他不主张我到外面去读书。在母亲的帮助下，有一天夜里我悄悄地离开了家，搭上一辆马车，两天后到达了哈桑。

我的舅父吉那都拉在哈桑作小买卖，收入微薄，但他终于帮助我进了寄宿小学，每天给我十个戈比，作为我的伙食、购买书籍纸笔之需。这一年我正十一岁。穷孩子读书是不易的，二年后我略具写算知识，便希望能找到一个还能继续自修的职业，从而减轻舅父对我的负担，并能给贫苦的双亲一些补贴。1909年，我舅父把我介绍到哈桑的一家书店里作学徒。书店里当然不缺乏书，但是学徒的工作，一年到头总是从天亮到半夜。那时候，我的心情正像喉咙干渴，面对着几皮口袋马奶子，而又无从尽情饱饮一样。

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一个来书店买书的商人谈到，他们的商店需要能写会算的学徒。他们的商店在中国还有分店，比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那里业务兴隆，也需要人。我一听到新疆（那时候中亚商人是把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的），便想起了祖父的话，油然而生了向往之心。幸好书店有没有我这样的学徒并不影响它的业务，于是我便随着这个商人到他的斜米总店作学徒去了。

这个商人名叫司马益，是天兴行资本家依斯哈克的弟弟。天兴行是专门经营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资金雄厚，是弟兄合伙的买卖。我在斜米工作了不到一年，终于实现了我的想往：被调到这家

商店的乌鲁木齐分店去。

1912年9月,我以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只身回到百多年来我的祖、父所依恋的祖国,后来还把一家人都拖了回来。

二 帝俄籍商在新疆

天兴行乌鲁木齐分店开设在乌鲁木齐南关的贸易圈里。当时人们把这条街叫作洋行街,因为街上的商店大都是帝俄籍商人开设的,商店的招牌上都写有“俄商”字样。

贸易圈这个名词,就是在几十年前,内地人听来也是生疏的。它最早叫买卖圈子,实质上就是帝俄在乌鲁木齐霸占的一块土地,同当年天津、上海的租界地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帝俄政府以不平等条约——1879年《伊犁条约》,取得了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同时在该不平等条约内还援引另一不平等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的条款,取得了中国官厅“应给予所盖房屋、牧放牲畜、设立坟茔等地”的权利。这些所谓“给予”地,在市内的便叫贸易圈,圈里的一切事务都由帝俄的领事馆管理,中国官厅无权过问,虽然在上述的不平等条约内并无明文规定。乌鲁木齐的贸易圈是1895年划的,有无文约,我不了解。我在天兴行的日子,这个贸易圈的范围是北起皇城巷,南至三通碑,东达义冢,西尽西河坝。《新疆图志》关于乌鲁木齐的贸易圈有这样的记载,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划贸易圈于迪化,是三道桥南官大路东西两段地方。

当年开设在乌鲁木齐贸易圈里的较大的洋行一共有八家,其中最大的是鞑靼人胡赛音、哈桑兄弟等的吉祥涌;其次是鞑靼人伊斯哈克兄弟等的天兴行,乌孜别克人伊敏江、土尔逊巴巴的德盛行,乌孜别克人美尔沙里、拉合满巴依的德和行;再次是乌孜别克人满素尔江的吉利行,乌孜别克人塔居斯曼的仁中信行,鞑靼人孜牙巴依的芝盛行,乌孜别克人阿布特的茂盛行。这些商行在斜米、

塔城都设有总店和分店,有的还在吐鲁番、奇台等地设有分店^①。商行的资本家都是随着殖民地掠夺而兴起的暴发户。比如吉祥涌的创始人拉马占阿吉,原来是个车夫,他的承继人——他的侄儿胡赛音是个贫农。

新疆原来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十八世纪以来,外资逐渐侵入,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它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主要是帝俄和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猎取地了。单以我所在的天兴行说,每年它的乌鲁木齐分店从俄国运入的各种布匹就有二千捆,每捆二十匹,每匹三十米,合计达一百二十万米,它从新疆运出的土产,仅棉花一项就有九万余公斤^②。

当年这些洋行经营的进口货以布匹、铁、砖茶、红茶、糖、棉线、石油、纸烟、火柴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出口货以牲畜、羊毛、羊皮、羊肠、棉花、干货、兽皮等为主。它们经营土产的方式是,在生产者需要资金的时候,以预付货款的方式把进口货和一小部分现金付给生产者,订立如期交出土产的合同,如果到期不能交出,则须加几成甚至加几倍处罚。当年新疆的农、牧民因封建剥削残酷,加以生产技术落后(当然这也是封建制度的结果),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每年都需要举借生产以至生活资金,而地方上的高利贷使他们无法喘息,因而宁愿接受洋行的订货预付款。至于大地主、大牧主,因生活上的大量消耗,以及需要洋货供自己享受,也大都听凭洋行摆布。就我记忆所及,洋行同农、牧民或地主、牧主订立购货合同,一般是通过地方商人。因预付款而取得的利润是非常大的。比如当时棉花的市场价格每百斤为新疆纸币四十两,而因预付

① 1907年前后,乌鲁木齐帝俄籍商三十余家,商人(包括行商)八百余人,年终存货多达三十万卢布。

② 本世纪初,从乌鲁木齐经由帝俄籍商人每年运入俄国的羊毛值五十余万卢布,羊肠值五千六百余卢布。我到乌鲁木齐的那一年(1913年),新疆对帝俄的贸易总额,输出为九百八十万卢布,输入为八百四十万卢布。土布(新疆把土布叫作搭连布)纺织业在洋布的大量输入下,已濒于破产。

货款，每百斤只给十五两到二十两^①。这样，除中间人的佣金外，洋行也获得将近一倍的利润，而且预付款大都折成洋货，洋行从土洋货的差价上获得的利润就更大了。

但是这些洋行当年所以暴发，而且几乎掌握了北疆的商业经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经营进出口贸易不纳税。1851年在平等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内规定“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以后在1862年《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税则》、1881年《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内，规定中俄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而在1880年《改订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内竟写下“……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

清王朝以后曾几次向帝俄政府交涉，取消不纳税的规定，但都无结果。我到乌鲁木齐时，帝俄籍商人经营贸易依然不纳税，不但自己不纳，还往往包庇中国商人不纳税，甚至在新疆境内作内贸也拒不纳税了^②。这样，他们所获的利润就更大了。而且那时候帝俄正在奖励本国货出口，对运货去新疆的商人不但免税，而且还给予奖励。有一个时期，已缴税金的商品，如果改运新疆销售，帝俄税务机关根据商人的申请，查明属实，就把已缴的税金退还给申请人。又俄商凡运一马驮俄货入新疆，俄政府有关机关还给与业主十六个卢布的奖金。当年中国商人从天津、北京运货来新疆，或由新疆运货去内地，要通过重重税卡，当然不能同俄商竞争，北疆的商业经济便由这些俄商操纵了。

俄商所持的借以免纳税款的通商执照，是由帝俄领事发给的，但须有中国外交官在上面签字。这种执照当年在新疆通称“通商

① 新疆纸币当时是以两为单位，1914年纸币一百两约合白银六十两。

② 当时帝俄籍商人还从汉口贩运土产经新疆出口，但是有时候他们在沿途出售（比如在酒泉、哈密等地），也拒不纳税。

票”。按照原来规定,通商执照的有效期为半年,并须在票面上注明商人姓名、货色、包件数目。但后来俄领滥发,并把有效期改为一年,且不详注持票人姓名、货色、包件数目,而只写商人某某赴天山南北各城贩货,随带本金俄帖若干、银若干两(当年英帝国主义援例,英籍商人同俄商在新疆享有同样权利)。这样,税卡既难于查验,而且俄商依恃外势,往往也不听税卡检查^①。此外,中国商人往往出价借用俄商的通商票,或者通过俄领在新疆各大城镇指派的“商约”(也称“商总”,维语 Ak-sakal,意为“绅耆”,表面上是各该地俄商推举的、办理有关俄商事件的人,实际却代行领事职能并担任坐探)向俄领领取通商票,用来冒充俄商,借以免纳各项税金并欺压本国商民;帝俄领馆为了拉拢地方商民外向,当然也乐于发给。而那些商约还发给俄商、甚至中商手书小条,只注明某某运货若干去某地,作为临时性的、代替通商票的免税证明。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截至俄国革命、帝俄势力在新疆垮台前,有关这类事件的交涉,层出不穷。

当年,新疆土产每年经由乌鲁木齐运往俄国的有十五万骆驼,每驮按十普同(每普同合十六公斤)计算,就有二万四千吨。运入乌鲁木齐的洋货,数量上也不少于此。每当春秋两季,货物大量出入时,驼铃响彻乌鲁木齐——塔城——斜米的路上。新疆的土产由此再往下新城(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运发,在当年欧亚商人云集的下新城临时交易市场上,新疆土产是惹人重视的商品之一,经营这项商品的商人,以及购之作原料的工厂主们,都直接间接地榨取了新疆劳动人民的血汗,从而发财致富^②。

① 这里且举一个事例:哈密商人阿赫毛拉(此人后来在盛世才时期曾任省银行副行长),某次去四川办货,借用吉祥涌的通商票,他回来路过肃州,税卡要他上税,他一时没有找到通商票,就顺口说他是西国人,竟混过去了。

② 按当年帝俄对新疆的进出口贸易,北路以斜米为总汇,南路以费尔干为总汇。我国土产经伊、塔两地运往俄国的不只是新疆土产,俄商还从内地贩运土产,或经海道运往西伯利亚,或经嘉峪关运经新疆入俄。

我所在的天兴行的资本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里且具体而微地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当年天兴行总店在斜米，经理是依斯哈克，他们弟兄四人，除他本人和一个弟弟司马益在斜米外，塔城分店是由他的弟弟阿里夫和依布拉音主持，乌鲁木齐分店的经理是外聘的帝俄籍鞑靼人哈桑，吐鲁番分店是规模最小的，因为经常直接同当地人接触，依斯哈克任用了一个吐鲁番当地人穆海特作经理。

天兴行在新疆的各分店，每年都按不同土产的生产季节，或直接派店员，或委托中国商人到各产区去订立收购合同，有些生产者还直接到各分店的门市部来买卖货物或讲交易条件。许多中国商人和资金较少的帝俄籍商人，也与天兴行有交易往来，但其中只有极少数商人同天兴行有单纯的货币资金往还，而且事例也是不多的。所有的洋行都不作买空卖空的买卖，而且也不注重点缀店铺门面。

洋行收购的土产在外运前要经过加工，因而它们所获的利润里也包括着对加工工人的剥削。比如夏羊毛（五月份剪的）收购后要按毛色分类，投入水槽搅拌，洗去土砂、粪便等污物，再晒干、打包。乌鲁木齐南梁，有个地方叫羊毛湖，就是当年洗羊毛的地方。秋羊毛（九月份剪的，毛短，主要用于制毡子）一般不洗，但也要按毛色分类。皮棉要经过清花，羊肠要由专设作坊刮去肠油、腌制，……各种土产都要按其性质加以不同的包装。比较大的洋行都有自己的加工作坊。

加工工人，主要是临时工。我所在的天兴行在忙时要雇一百多个临时工，临时工的每日工资按劳动性质的不同，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二角到六角，工资之外，只供应茶水，工时每天十至十二小时左右。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讲，工人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这些临时工主要是维吾尔人，以及少数哈萨克人和回族人。也有女工，大都作清花、按色别分类羊毛等工作。同内地的工厂一样，洋行的上层分子对女工往往加以人身污辱。

因为新疆的土产出口,牲畜也占大宗,所以洋行还经营牧场,来牧放他们收购的牲畜并从而孳生幼畜。

洋行的牧场最初是根据前述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但在不平等条约内所指的,不过是供领馆及侨民临时寄牧自用牲畜的地方,但洋行则不但任意扩大这个地方,还用欺骗和行贿等手段霸占水草丰足的牧地。比如天兴行在昌吉县三屯河地方就有一大片草场,经常在那里牧放的羊群有二千多只,其他牲畜也为数不少。据我所知,天兴行的这片草场就是用行贿及外交压力从县知事手中取得的。

当年奇台县属南山白杨河以东的牧场,尽为天兴行等十余家洋行霸占。1915年省长杨增新曾令交涉员向帝俄驻迪化总领事交涉,俄商牲畜不得强占民地牧放。在他给交涉员的令文里说:“且该俄商等故意纵放牲畜,伤害禾苗,一经百姓查问,动启反噬行为。甚至割民之耳,殴人致毙……该俄商等贩卖牛羊马匹不下十余万之多,霸占山场粮地,长此牧放孳生,实属无此办法。……”^①当然这类交涉是得不出具体结果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新、俄间的贸易趋于萎顿,一个时期若干洋行转向以经营牧业为主,成了大牧主。

洋行对职工的剥削也是残酷的。例如天兴行乌鲁木齐分店的固定职工通常在十五人左右。经理哈桑是资方代理人,每月薪资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二百五十元,食宿均由洋行供给。一般职工的薪给,除收皮等专家和会计略高外,店员和学徒月薪合现在的人民币二十到四十元。学徒虽由洋行供给伙食,工资也都被简单的生活用度耗去。这些职工,除了经理,每日工时都在十小时以上。一年间除了开斋、宰牲两个节日,是没有休假日的,而且在节日里,职工们要参加招待客人的工作,比工作日还要劳累。1917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我同德合行的夏卡夫联络不少洋行的职

^①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1页。

工，联名向资方提出了星期五休假一日的要求^①。资方同我们到帝俄驻迪化领馆去打官司。领事迪牙阔夫鉴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对我们让步，结果，我们取得了星期五休息半日的权利；过了一年，又争取到星期五全日休息。同我共同领导这次斗争的夏卡夫后来去苏联了，听说他现在在乌孜别克共和国科学院作院士呢。

洋行资本家那时候有事便找帝俄领事馆，一般很少同中国官厅往来，只是每年春节按中国商店的例子，宴请地方官宪，并打制精美的洋点心馈赠有关的官府和中国同业。他们请客时一定要把帝俄领事也请来，以壮他们的声势。他们心里瞧不起中国官宪，但是摸清了中国官场讲面子的风气，遇到机会总是不惜金钱进行拉拢的。比如当年假道俄国往来北京的官员们，都接受过俄商在斜米、塔城等地的“盛情”招待。这些俄商在这方面送人情，作为此后取得招待者的回报。当然，除此之外，遇到非通过中国官厅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时，他们也是暗中行贿的。那时候的吐鲁番县知事张华龄、迪化县知事陈继善都受过俄商的多次贿赂，因而在俄商同地方商民发生债务和其他纠葛时，上述的两个县知事总是偏袒俄商的。

在这方面，当时的省长杨增新却是清白的。实事求是地说，杨增新本人直到他被刺身死，从来没有接纳过俄商的贿赂。他从1912年主政起，屡屡为有关俄商、英商的交涉伤脑筋，他深深了解吃这些人的钱无异把剑柄给人，会因此身败名裂。他常常告诫他的部属不得与俄商作私人往还，互相馈赠，以免惹事生非。那时候各地的俄国商约依恃外力，威胁官府；官府为了保持自己的禄位，也多曲予迁就，甚至在商约到县衙办事时，有的县衙竟大开中门，鸣炮相迎。杨增新为这件事曾三令五申，要各县知事注意国家体面和自己身分，取消这种媚外的接待仪式，并定下接待商约的办法。当然单凭这些是不足以戢俄商的气焰的，只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

^① 伊斯兰教徒把星期五叫作“祝马日”，是大祈祷日，所以把每周的休息日放在这一天。

白俄势力在俄罗斯国内被彻底消灭，俄商才渐渐老实了。但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还拥有大量资金^①，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地位。

1917年俄国革命后，许多俄商把资金和家眷都迁入了新疆，天兴行的资本家依斯哈克便是其中的一个。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削弱后来竟至断绝了新疆俄国间的贸易，而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国内被铲除掉，在流亡到新疆的俄商看来，这无异是给他们敲丧钟。他们日夜注意俄国国内革命局势的发展，在反革命的白俄政府在伊尔库次克成立后，俄商还派人去与它取得联系。在我未离开天兴行前，经常看到这些褪了色的资本家经常聚集在一起，互相探讯有关俄国的消息，并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编造一些自慰的消息，比如说英日联合进攻俄国革命政府了，某某白俄将军在俄国的某某地方得手了，美国军队攻入彼得堡了，英国干涉军占领塔什干了。而最值得介绍的是，当时有个俄国老律师皮斯特洛渥，他逃来乌鲁木齐后，自称“灵媒”，能招神灵附入人体，解答世人提出的祸福休咎等问题。这同解放前汉族中的扶乩、跳大神等有些相似。洋行街的俄商们往往把这个老头请来，大家坐在黑屋子里作招神的把戏。皮斯特洛渥既迷信而又狡猾，他借此来骗取俄商们的尊敬和款待。有几次我也参加了，看出了这个俄罗斯老头的门道，我就装作神灵附体，起初用脚来踏地板，表示神已降临，随后便改变嗓音回答在场的“俗子凡夫”们的问讯。每当他们问到“布尔什维克能不能消灭？”我总是回答：“不能消灭！”或“消灭不了！”问到“沙皇什么时候复辟？”我总是回答：“公羊生羔的时候！”或“什么时候也不会复辟！”为了取信于在座的大腹贾并迷惑皮斯特洛渥，我在到皮斯特洛渥家去的时候，找机会把他家里的小东西悄悄地揣进怀里，在招神的时候再悄悄地从一个角落上把它丢到大家围坐的桌子上，使得这些以神来自慰的人们益感惊奇，他们说：“全能的神啊，把信物都带来了！”因而对我装神时回答他们的话，更感到彷徨

^① 天兴行的资本，1914年前后为二百万金卢布，合黄金三万八千两。

不安。

依斯哈克为人傲慢,对本店的职工更暴躁,随意辱骂。有一次在招神的时候,我假借神灵附体,打了他一记耳光。当时把他和皮斯特洛渥等人都吓坏了。皮斯特洛渥战战兢兢地说:“神可别生气啊!是我们不好啊!”我算痛快地发泄了对这群洋商们的愤恨。我的行动后来被同事塔依尔阿訇猜到了。我对他说:“你不要揭穿,这是我们对巴依们的‘盛情’的酬答!”^①

他们往往还请阿訇诵经,祈祷真主降罚给布尔什维克,保佑沙皇复辟。

我们当时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真谛,但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并接触过一些进步读物,却了解到巴依和我们不是一类人,而是利害绝对不同的对立的人,那么,这群俄商们所憎的,一定是我们应该欢迎的。于是,他们祈祝的我们便诅咒,他们诅咒的我们便祈祝,不能让他们再得到他们所失掉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喜悦。在当时这种情感可以说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自发的阶级情感。

现在回想起来,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在中国参加欧战后,1918年日本派一批所谓调查员到新疆来。1919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个子来到我们的商行里,皮鞋踏在地板上吱吱作响。有人告诉我,这是日本人。不久后这个日本人被依斯哈克和其他俄商请到家里去喝茶,我趁作翻译的机会,听到这些俄商对那个日本人说,他们想加入日本籍,从而取得日本保护。日本人回答他们说,如果有四十户俄商申请加入日本籍,日本帝国政府可以借此向中国政府交涉,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保护”他们的“权益”。但是后来,俄商想加入日本籍的凑不够四十户,再加上其他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向往没有实现。

俄商在俄国革命后,有一部分歇了业,大部分则转营内贸,新

^① “巴依”,维吾尔语,意为“财主”。

疆地方同苏联恢复通商关系后，资金雄厚的俄商又兼营起内外贸易。当然，他们在帝俄时期所享受的“特惠”都没有了。他们看到形势一时不能如他们的主观愿望转变，便申请加入了中国籍。一直到1922年我离开天兴行，像吉祥涌等几家商行，在新疆的商业经济上还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到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有些人还登上了政治舞台。至于他们的生活享受在社会上是首屈一指的，他们起居饮食的豪奢，就是当时新疆的讲究物质享受的大官僚们，也是难望其项背的。

最后还应该提到一件事。这些俄商们都自命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是他们却经常借宗教来行小惠，欺骗教徒。比如在教规上有扎卡提税，即教徒每年要以自己动产的四十分之一“接济”穷人。天兴行的执事人在“接济”之前，总是吩咐我们这些学徒把滞销货和积压多年业已变质或不堪着用的东西从栈房里拣出来作为“接济品”。再有，有的债务人真的还不起欠他们的财物时，他们也来一套“宗教仪式”，把负责人应该还他们的财货折成货币，然后拿出一包东西作为这笔款的代表，当着负责人的面把这个包在念罢祈祷词后递给负责人，算是他们的“慷慨”赠赐，随着又把这包东西从负责人手里取回，算作负责人还清了他们的债务。他们说，他们这样作是奉行真主的意旨。在当时，穷人的觉悟尚未提高，有的真的被他们的这套手法蒙蔽住了。

前后十二年的洋行生活，使我明白了不少人生社会的道理，为了进一步满足自己对这些道理的追求，在这十二年里我还从俄国买来一套多年制中学的全套课本和新书刊进行自修，同时还学习汉文汉语。天兴行可以说是“我的大学”。在写这段东西时，我曾翻阅几十年前仅存的笔记本，发现在一个笔记本上有当时我用汉字写的一句话：“小子读书不用心”。当年硬挤时间自修和老板对我以及对同事和穷苦人民的剥削、欺骗等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可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往日的情景是一去不复返了。

三 在革命动荡中的两件事

1912年9月我踏上祖国的土地，距武昌起义已经将近一年了，可是我在塔城街头并没有看到什么新的气象，副都统出门还是坐轿子，鸣锣开道，衙门口还摆着棍棒和囚人的木笼。市集和一些广场上公开摆设赌摊，赌博拈擰子在那里骗人，有时竟大打出手^①。

当时，我对这些现象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觉。在斜米我从报刊和人们有关时事的谈话中，知道祖国起了革命，清朝的皇帝已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当年在俄国，谈论革命并不新奇。对一些人来说，革命是毁灭的代用语；但对广大的人民来说，革命则是希望。可是起了革命的祖国，怎么看不出什么含有希望的东西呢？据天兴行塔城分店的人讲，新疆现在还分成两派，新派本年初在伊犁闹革命，杀了伊犁将军，成立了革命政府。旧派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出兵“讨伐”。他们双方在伊犁到乌鲁木齐的大路上固尔图等等地方打起来，而且打得很厉害。后来北京皇帝退了位，成立了中华民国，新疆巡抚“袁大人”不得不派代表同伊犁谈判和平，6月间双方终于在塔城签订了和议条件。现在“袁大人”已经回了北京，新疆由“杨大人”统治了，听说官衔改成了都督。只是乌鲁木齐同伊犁还没有和好，同时，南疆一带也很混乱。

根据分店里的同事们的谈话，新疆是在革命和动荡里，不过我从塔城去乌鲁木齐的路上，却没有发现什么不安的现象，只是乌苏城内外驻扎着很多省里的军队，据说是准备往精河开的。

到了乌鲁木齐安顿下来之后，我的对祖国的关怀和好奇心驱使我接触现实，从而听到、看到许多事物。现在回忆起来，其中有不少已经为后来的报刊或专著所记述，在此地没有重述的必要，我只

^① 新疆土语把靠赌钱骗人的人叫作“赌博拈擰子”。

把下面的两件事写一下。

其一是，1912年1月的伊犁起义是得到当地少数民族支持的。

当年，伊犁是少数民族荟萃的地方，城市里维吾尔人、回族人占的比重较大；被编成旗营的有锡伯人、达斡尔人（索伦人）、察哈尔和厄鲁特蒙古人；还有过游牧生活的哈萨克人、蒙古人^①。他们都直接受伊犁将军的统辖，除了王公、台吉等上层分子，他们几代都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对统治阶级自然会有好感。至于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没有保障同挟有“特惠”的俄商竞争，对现存政权也是不满的。尤其是帝俄领馆在伊犁遇事专横，俄侨倚势欺压地方居民，而将军、副都统则但求敷衍，不能为人民与外力抗争，就更加剧了居民同统治者的矛盾。伊犁在当年是个对外的通商口岸，从东方和西方流入的民主思想在上述的居民心理上是很容易发生作用的。

以杨缵绪为首的革命党人估计到少数民族将在革命运动中起一定的作用，因而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他们的革命策略之一。他们曾着重向维吾尔人、回族人宣传，指出在新疆的高级官吏中虽然有不少汉族，但是他们是清政府的代表，他们在镇压、迫害人民方面，对待汉族同对待其他民族是不分畛域的。革命党人所编的白话报也用少数民族的文字印行。

革命党人还以哥老会作为组织群众的手段，当年在伊犁开山立堂的徐三泰曾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参加。哥老会本来是个以游民为主体的、着重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组织，它的组织思想相当开阔，没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不拘泥于民族和宗教界限，在反封建和反帝上是四海一家的，因而能够吸收到少数民族参加。

^① 在伊犁境内的哈萨克人属于黑宰和阿尔班两部落，当年游牧于博罗塔拉；蒙古人有西路旧土尔扈特，牧地在精河南岸，厄鲁特蒙古是准噶尔子遗，察哈尔蒙古是清乾隆年间自宣化边外迁来伊犁驻防的。